

张一兵 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MAKESI ZHUYI ZHEXUE BODAO ZIXUANJI

张亮集

马克思的哲学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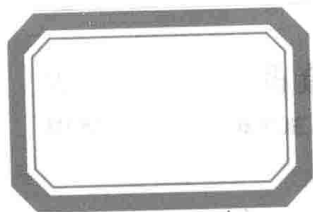
MAKESI DE ZHEXUE DAOLU JIQI DANGDAI YANZHAN

及其当代延展

ZHANGLIANG

张亮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ODAO ZIXUANJI

张亮集

马克思的哲学道路 及其当代延展

MAKESI DE ZHEXUE DAOLU JIQI DANGDAI YANZHAN

张亮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的哲学道路及其当代延展. 张亮集/张亮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3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ISBN 978-7-214-09270-0

I. ①马...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4368 号

书 名 马克思的哲学道路及其当代延展·张亮集

著 者 张 亮

责 任 编 辑 戴亦梁

责 任 校 对 鲁从阳

装 帧 设 计 许文菲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插页1

字 数 268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9270-0

定 价 27.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告别我的“学徒”时代

1995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大男孩，虽然“好读书，不求甚解”，但学术研究并不是我的选项。不过，恰如南朝哲学家范缜所言，“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我在“偶然相遇”中投入业师张一兵教授门下，未几，居然混沌初开，窥见学术研究之门径，先“好之”，再“乐之”，最终决意“以学术为志业”，成了一名哲学的“学徒”。我的“学徒”生涯无疑是快乐的，否则我也不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2011年秋，一兵师突然倡议本专业的相关老师编选论文集，以展示各自的研究风貌。此议一出，我先是有些欢欣雀跃，随即让一个突兀的事实着实吓了一跳：一晃，十七八年过去了，我这个当年的小“学徒”现在也已经“四十而不惑”了！看来，是到了向自己的“学徒”时代说再见的时候了。

—

记得我刚刚开始做“学徒”的时候，哲学还“贫困”，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贫困”。即便如此，始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坚持研究，其中

就包括一些当时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他们不仅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还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学术心态,以及重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决心。一兵师就是这一优秀群体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当时,他正在准备一部新的著作,力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所提供的文献学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由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孙伯鍤教授开创的“深层历史解读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意蕴尤其是革命的科学的批判方法在当代语境中自己呈现出来,从而服务于我们对身处其中的现时代的批判性认识。那时候,以一兵师为核心,以专业中的青年老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体,自发形成了一支不大的研究团队,坚持开展有规律的研讨活动。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和唐正东、杨建平、胡大平、仰海峰等学长、师兄一起,全程见证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回到马克思》这一非凡著作的创作过程中,从而深刻领会了“深层历史解读法”——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文本学方法——的世界观精神和方法论要义。对于我的“学徒”生涯来说,这段经历是极其宝贵和影响至远的。

从研究对象上讲,我的“学徒”生涯起步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学习与研究。事实上,我最初的几篇学术习作都聚焦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学解读。这一方面和《回到马克思》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和专业倡导精读经典的传统有关。按照我的体会,精读经典好比反复练习拆卸枪械,看似简单重复、毫无新意,却最有助于掌握经典和领会方法。所以,整个硕士研究生阶段,我都乐在其中地精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进而把青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这一陈旧得有点老掉牙的课题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在这篇论文中,我比较熟练地运用文本学方法重新解读了马克思1843—1844年间的相关著作,提出并初步阐明:就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历程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一个扬弃费尔巴哈隐性唯心主义的过程。今天看来,该文显然不够成熟。不过,正是在这种不成熟中,作为“学徒”的我开始走向成熟。

研究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哲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撑性背景。为此，在精读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同时，我还系统地补了黑格尔哲学的课。读黑格尔哲学，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切入点。尽管传统的主导性切入点是《逻辑学》或《小逻辑》，但我还是决意从《精神现象学》入手。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更重要的是，基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积累的经验，我坚信，我们应当历史地对待黑格尔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恰当的做法是从《精神现象学》出发来理解《哲学全书》，而不是相反。烧公鹅的调料也是烧母鹅的调料。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研究方法应当同样也适用于对黑格尔哲学形成史的研究。当我把文学本方法移植到《精神现象学》研究中后，取得了意料中的成功。这进一步深化了我对文本学方法的体认，同时让我对《精神现象学》产生了持久的研究兴趣。所以，在后来的“学徒”生涯中，我曾多次重访这一经典，先后就马克思和《精神现象学》、卢卡奇和《精神现象学》等论题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二

做哲学的“学徒”，冷板凳自然是要坐的。为此，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几乎天天泡在哲学系资料室里。刚开始是为了查找必要的资料，后来则是习惯成自然，很享受文献过手的快感。这种看起来有些无聊的习惯让我后来的“学徒”生涯受益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较早形成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史意识。当然，只是在十多年后，这种学科史意识才陆续结出了果实。

进入新世纪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终于走出长期的“困境”，迎来复兴。当时，不少学者都认识到，为了更好地前进，必须超越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可是，究竟什么是传统研究范式？它与所谓的苏联范式又具有怎样的关系？学界对此莫衷一是。2005年，以对苏联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分期模式的批判性分析为起点，我对所谓苏

联模式的形成、特点及其历史效应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理。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史反思,大致厘清了这一学科的建构历程,并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出发进行了批判与反思。我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向那些对本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致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也只有通过对自身历史的批判继承,才能找到完成时代赋予的理论使命,推进自身科学发展的创新之路”。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复兴,沉寂多年的西方“马克思学”也重新回到国内学界的视野中。所谓西方“马克思学”,简单地讲,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19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苏联学界的批判性评价为中介,这一学术潮流就已经被引入国内学界。80年代末,国内学界曾出现过一次批判地研究西方“马克思学”的小高潮。本专业的孙伯铤教授、侯惠勤教授等曾于90年代初出版了一部非常有分量的《西方“马克思学”》。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进入长期“困境”后,这一学术潮流迅速淡出人们的视线。也就在这一期间,我不自觉地涉足这一领域,把当时能够找到的西方“马克思学”代表性著作都翻阅了一遍,进而认识到:对于西方“马克思学”,苏联以及国内学界以往的评价存在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在保持必要的意识形态警惕性的同时,我们应当历史地、具体地、客观地对待这一极其纷繁复杂的学术潮流。坦率地讲,我当时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关注多少有些翻故纸堆的意味,没指望会产生什么结果。不料,几年后,我突然发现,还有人以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对待西方“马克思学”!于是,我先发表了一篇系统评论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的文章,然后另文正面阐发了我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实质、学科史分期等基本问题的理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以我的这种再评价及其引发的争论为起点,西方“马克思学”后来居然成为一个小小的学术热点。不过,必须申明的是,与抽象的名词之争相比,我更愿意把精力投入到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逻辑的深入研究中去,更多地发表像《20世纪上半叶西方“马克思学”的马

克思传记建构》这样的论著。

三

1998年，我毫无悬念地选择了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我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很想继续耕耘这块熟土，进而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大显身手的主攻方向。可一兵师并不以为然。一方面，他始终告诫我们不能放松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提醒我们，必须及时走到当代。为了根除我们踟躅不前的惰性，他后来甚至宣布，今后做博士学位论文不能再挑1968年以前的选题！这种“驱赶”看似有些不近人情，不过，身为“学徒”的我深深地知道，不经受这种“驱赶”，就得不到真正的独立。

经过几番变动，我最终选定以阿多诺的早中期哲学思想为对象做博士学位论文，其成果就是2003年出版的《“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在这部著作中，我对阿多诺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早期的主要哲学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首次揭示出了“崩溃的逻辑”这一段不为当时国内学界所知的思想建构历程，从而为人们进入阿多诺最后的也是最受当时国内学界关注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迷宫提供了一条畅通的道路。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学界不错的评价。我作为具有独立执业能力的高级“学徒”身份由此基本确立。

在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之后，我很快就转向了新的研究领域。然而，我始终保持着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兴趣，借着完成约稿和集体合作项目的机会，继续思考相关问题，从而在以下三个方面形成了新的认识：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从德国思想文化主流中杀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果不能够真实再现该学派与当时德国思想文化主流的批判—继承关系，就不可能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该学派的有关学说。例如，20世纪50年代，阿多诺为什么会在延宕多年之后重新批判胡塞尔现

象学？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看到：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终点，与纳粹具有本质关联的海德格尔哲学在战后的复兴乃至成为一种时尚，不过是垄断资本主义摆脱危机、进入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阶段的表征。既然海德格尔依旧是一个问题，那么，对作为海德格尔哲学理论起点的胡塞尔现象学进行批判性对话就仍旧具有现实性。同样，面对海德格尔艺术哲学在 60 年代初的突然流行，阿多诺的《美学理论》的一个核心命意就是要与海德格尔来一场批判性对话，从而敦促人们正确认识艺术的当代发展，正确评价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进步性及其真理潜能，同时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在当下这个被全面管理的体制化世界中，真理依旧存在于艺术之中，但它再也不是以过去那种显明的方式存在着了。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体系是一座巨大的冰山，人们所熟悉的文化批判理论、哲学批判理论等不过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小部分，对于该学派的理论建构和转型而言，真正重要的恰恰是隐藏在海面下的、不为人所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格罗斯曼和波洛克先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例如，在对格罗斯曼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的再考察后，我发现，格罗斯曼 1929 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在事实上为法兰克福学派当时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必需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然而，1929 年的“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新发展，这使得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很快就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最终被法兰克福学派所放弃。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价值主要在于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经验：第一，正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本质，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第二，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变化了的现实的分析研究，在发展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能否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第三，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研究变化了的现实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学具有无可取代的基础性地位；第四，要重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

四

2003年以后，在很多同行讶异的目光中，我告别经营多年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转向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德国传统到英国传统，这种“跳跃”不可谓不大。促使我下决心进行这种大跨度“跳跃”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一兵师的推动。当时，专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国内学界找到了自己的恰当位置。那么，接下去专业应当怎样继续发展呢？基于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功实践的深入反思，一兵师认识到，“学派不应当是一些高度相似的‘摹本’的积聚，而应是一个由一些具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独立的理论个性的学者在共同的理论旨趣、研究方法和学术资源基础上共同结成的理论联合体”。换言之，一兵师深明“学我者生，似我者亡”（齐白石语）之真意，因而坚决要求我们这些“学徒”尽快走出他的荫护，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空间并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异军突起和大放异彩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学术事件。不过，当我开始移师这一领域的时候，国内学界对此还所知甚少。在对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初步分析后，我发现，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和世界性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无可置疑的双核心作用。于是，在听取了师兄胡大平教授的意见后，我决定选择爱德华·汤普森进行一次深度的个案研究，以期由点及面地进入英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全新的理论领域。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的合作导师钱乘旦教授：作为国内最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史学家，他对作为历史学家的汤普森的评论虽然不多，但总是让我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如果没有这种指点，我或许要在黑暗中独自摸索更长的时间。2008年，我结束对汤普森的个案研究，出版了《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一书。同时期，我也对威

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做了一点研究。这些前期研究对我比较完整准确地把握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立场和理论特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汤普森研究之后,我开始转向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研究,首先解决了历史分期问题。按照我的研究,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1956年以后的事情,但它的孕育却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那时,后来成为第一代新左派的左派知识分子自觉延续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20世纪30年代开辟的道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南,研究、解决当代英国人所关注的具体的英国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新左派运动兴起后,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成功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英国文化问题的研究,就文化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提出了全新的认识,从而创立“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确立,大多数第二代新左派最初都表现出了由衷的欢迎。不过,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大举登陆,70年代初期以后,几乎所有第二代新左派都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并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建构出了一个与作为原生形态的后者双峰并峙的次生形态。70年代,两代新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理论冲突。就在双方的理论论战即将进入高潮之际,1979年,保守党重新执政。英国的资本主义重新焕发出了活力,曾经并不遥远的社会主义重又变得遥遥无期。这使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左派运动的存在基础受到严重侵蚀,开始走向终结。70年代就出现的各种亚政治的新社会运动逐渐取代新左派运动成为左派抗争的主要形式。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已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坚的第二代新左派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旨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元分化。英国马克思主义就此进入了一个多元分化发展的新阶段。

英国谚语说:“要想明白事理,须作长期学徒。”不过,花开花落终有期,“学徒”迟早得满师,转正,进而成为“师傅”,招收自己的“学徒”。如

今，无论愿意与否，我都得满师了。值此欲去还留之际，谨将此文集献给以各种方式教诲、关心、帮助过我的师长们，希望我这个“学徒”没有让他们感到失望！

目 录

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 1

- 一、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问题的重新提出 1
- 二、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走向“历史的”唯物主义 6
- 三、二律悖反在经济学视域中的消解 30
- 四、历史唯物主义对二律悖反的科学解答——一个简短的结论 61

《精神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 66

- 一、《精神现象学》的使命和体系：一个再考察 66
- 二、马克思和《精神现象学》：一个历史主义的文本学分析 81
- 三、以青年马克思为参照系透视《精神现象学》——卢卡奇《青年黑格尔》
解读 95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史反思 105

- 一、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历史形成：一种知识社会学审理 105
- 二、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历史之路 115
- 三、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范式生成与转换 133

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 149

- 一、阿多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149
- 二、阿多诺的艺术真理论及其与海德格尔的潜在对话 162
- 三、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批判的再考察 176
- 四、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 185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战后发展 196

- 一、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战后形成 196
- 二、英国马克思主义在 6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的内部冲突与发展 209
- 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发展 224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文化唯物主义” 240

- 一、E. P. 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文化概念 240
- 二、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与范式 254
- 三、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电视 268

作为模式的西方“马克思学” 282

-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的“模式”?——兼析作为“模式”的西方“马克思学” 282
- 二、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学”这个术语? 289
- 三、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传记建构:批判的评论 298

后记 312

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

一、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问题的重新提出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话题。从 1845 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起,对该问题的反思、研究就始终没有中绝过。如果我们对 150 多年以来的研究(反思)史稍稍加以回顾,就会发现这一老问题实际并未被真实地解决掉。

一般认为,马克思在 1845 年所创作的两篇重要著述《提纲》和《形态》,不仅是批判费尔巴哈的,同时也具有自我批判的意味。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费尔巴哈哲学在自己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性质及作用方式作一明确的指示。作为这一哲学事件的见证人,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主要基于自身的经历,对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判断。他认为,在德国近代哲学史上,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

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①恩格斯进而认为，费尔巴哈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②。继恩格斯之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普列汉诺夫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自德谟克利特以来 2000 多年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现代形态，费尔巴哈是其直接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正是克服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缺陷，方才使得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和彻底的世界观”^③。在《哲学笔记》中，列宁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详细研究，也认为费尔巴哈构成了德国现代哲学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中介环节。正是根据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这些论述，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苏联学界就此演绎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上的“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三段论模式。这一模式长期以来为前苏联和中国学界所因袭。

在 1919 年出版的《马克思传》中，梅林首先从史料文本的角度对恩格斯—列宁模式提出了质疑。梅林认为，是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而不是《基督教的本质》，曾对马克思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为“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里，还看不到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只是在《德法年鉴》上才第一次表示‘热烈地欢迎’这个新的世界观”，“《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思想无疑地已经包含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之中，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恩格斯的记忆有错误，那也是非本质的。但是他的错误又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模糊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联系”。^④ 英国学者麦克莱伦在《青年黑格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2 页。

② 同上书第 4 卷，第 211—212 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1 卷，曹葆华译，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779 页。

④ 参见【德】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69—70 页。

与马克思》一书中支持了梅林的观点。麦克莱伦认为,恩格斯对《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影响的评述完全是与事实不符的。“‘体系’远没有被‘炸开’,青年黑格尔派普遍认为费尔巴哈的著作是黑格尔学说的继续,是同布鲁诺·鲍威尔的《对无神论者,反基督者黑格尔的最后审判》一样站在同一路线上的。”^①通过对马克思 1843—1845 年间著作的引文的仔细考察,麦克莱伦进而提出,马克思在此期间主要受到了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的影响。^② 梅林和麦克莱伦的观点如今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这一观点是如此地有说服力,以至于连相对保守的前苏联学界都不得不在其权威著作——1979 年出版的《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中,对他们曾一直坚持的传统观点作出了重大的修正:“唯物主义的因素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对他本人来说是自发地、不知不觉地增长起来的”,与之相对应的是马克思对其唯心主义基础本身的怀疑,对这种怀疑的解决也就是他完全自觉地向唯物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造的预拟提纲》(即《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引者注)一书的认识,则促进了他的这个转变”。^③

我们以为,《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修正在某种意义上是致命的:既然马克思并非如传统模式所言,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转向唯物主义的,那么,任何一种(或黑格尔,或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公式都不能不是虚拟的了。因此,当最近国内学界有人反对传统解读模式,提出应当“让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阴影中走出来”的倡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马克思后来曾认为,与黑格尔相比,“费尔巴哈无疑是浅薄的”。但我们决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也想把费尔巴哈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中驱逐出去。实际上,马克思非常重视费尔巴哈对自己早期思想发展的作

①【英】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夷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96 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 105—118 页。

③ 参见【苏】纳尔斯基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金顺福、贾泽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7 页。